

陆士清 著

TAIWAN
WENXUE XINLUN

台灣文學新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台湾文学新论

陆士清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A0722521

(沪)新登字202号

1206.7
5965

责任编辑 杜荣根

台湾文学新论

陆士清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57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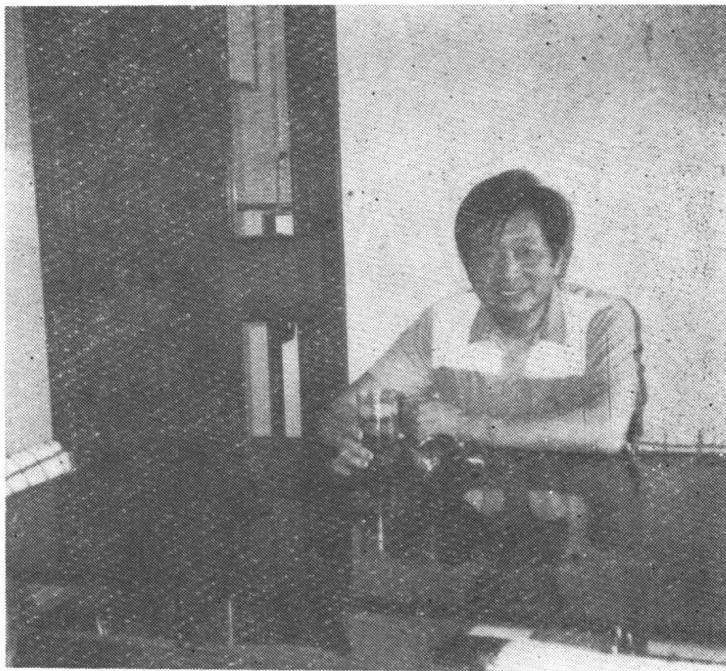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375 插页2 字数215,000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309-00974-6 / I·75

定价：12.00元



照片说明：1987年6月于香港中文大学居室

小传

陆士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33年生于江苏张家港市。1950年入无锡人民银行任职。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执教。历任中文系创作教研室、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1987年和1988年，先后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访问讲学，应聘为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客座副教授。先后主持编写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中、下三册）主编出版了《台湾小说选讲》（上、下册）、《台湾小说选讲新编》、《白先勇短篇小说选》、《王祯和小说选》。在国内外报刊发表研究台港文学的论文近百篇，出版了《三毛传》（与孙永超、杨幼力合著）。现任复旦大学台湾香港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上海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

开拓的实绩

——序《台湾文学新论》

蒋孔阳

1955年，陆士清同志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我们就认识了。以后在相互过从的当中，我们成了同事和朋友。他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做任何事，都生气勃勃，具有开拓进取的精神。即如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1978年，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在大学教学和学科的建设中，还没有怎样引人注意，他就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上，一马当先，率先主持编写了三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对曲折发展的中国当代文学运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作家和作品等，进行了历史的透视和总结，从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中，奠下了一块基石，留下了自己的足迹。1979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人们对“左”的一套尚心有余悸，我国大陆文学界绝大多数人对海峡彼岸的文学情况尚茫然无知的情况下，士清同志又鼓起了勇气，开始介绍和研究台湾文学。十多年来，在客观条件相当困难、资料相当缺乏的情况下，他执著努力，孜孜不倦，做出了值得称道的成绩。这本《台湾文学新论》，就是明显的例证。香港评论家黄维梁博士，誉之为是“先锋学者”的部分研究成果的结集。

士清同志研究的范围相当广阔，大凡台湾新文学运动发生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文学的动因，文学思潮的

演变，传统的继承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创作题材的拓展，主题意识的变化，风格的形成和出新，文学样式的兴衰等等，都在他研究探索的范围之内。但是，他的基点和追求目标却是全景观照，是宏观把握与微观深入的结合。在宏观把握方面，他将台湾文学置于整个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历史的追踪，对之进行全景的描述。例如《台湾新文学运动纵览》一文，即对台湾新文学的发展，作了一个总体的描述，使人对台湾新文学运动，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同时，在微观方面，他又对个别作家创作艺术的具体特点，对某些文艺思潮、文艺杂志、以至某部作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诠释和探讨。他不为积习和陈见所固，不为毁誉和流言所惑，而力求以批评家的理论勇气，实事求是地作出自己的判断，因而独具慧眼，言人之所未言。如《论杨逵小说创作的历史地位》、《融传统于现代——白先勇〈游园惊梦〉艺术追求》等等，都是例子。

台湾文学本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对之研究乃是应有之义。但因中国现代社会历史的特殊发展，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从而影响到台湾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既有其共同性，也有其特殊性。对之进行专门的研究，总结它的历史经验，介绍和阐释它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必将有助于处于分裂状态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文学的交流和融和，必将有助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士清同志的研究台湾文学，自觉地认识到他的历史使命，他是在有意识地为民族的团结、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一砖一瓦的贡献。众所周知，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1895年后，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50年。1945年光复了，但由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两极体制对峙的结果，1949年，台湾又与大陆隔离了。这是民族的不幸，结束这种不幸，是每个中华民族子孙的神圣职责，士清同志这本书，正是抱着炎黄子孙拳拳报国之心，希

望借助台湾文学的研究，促进两岸文化的交流，增进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为结束民族分裂、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创造条件。也正因为如此，士清同志十分关心台湾省内“统”“独”斗争以及它在文学、文化领域中的反应。值得称道的是，面对台湾文学、文化领域中的统独之争，士清不是视而不见，消极躲避，而是积极介入，去了解它，研究它。对台湾文学和文化界出现的与“中国意识”相对立的“台湾意识”论，以及淡化台湾文学的中国意识，歪曲台湾新文学传统、将台湾新文学界的前辈和精英，说成为“台湾民族主义者”等现象，他都坚持原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试论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的中国意识》一文中，他根据史实指出：“中国意识”恰恰是台湾新文学的灵魂。台湾新文学运动，“在动因和目的等诸方面都表现了强烈的‘中国意识’”。台湾新文学所蕴含的中国取向，即把台湾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连系在一起，把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希望寄托于祖国的复兴，他认为这是“中国意识”的突出表现。台湾新文学的先驱都有一个中国魂。他以丰富而确凿的史料，雄辩而有力地揭示了历史的真相。

士清同志是一个开拓进取的学者，也是一个治学谨严的学者。他研究台湾文学，注意材料的选择。他起步较早，在研究中一直忠于史料。台湾文坛思潮起伏，错综复杂，派中有派。他不是从派的概念出发，而是实事求是地以文学本身的现象为依据，以科学的文艺观为指导。对于不同的社会和环境以及不同的对象，也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不同的标尺来衡量。例如他在《谈欧阳子的“情结”小说》一文中，对欧阳子小说创作的评论，即是一例。士清同志的特长是治史，所以他能够以史家的态度来对待文学史上的史料和史实，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例如为了确切了解《文学杂志》的文学宗旨、创作倾向，以及它在介绍西方现代文学、催生台湾现代小说方面所起的实际作用，他检阅

了全部《文学杂志》，然后才写出了《〈文学杂志〉与台湾现代小说》一文，作出了科学的论断，纠正了因讹传讹以至胡乱猜测的错误。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之所论，基础扎实，经得起检验。

台湾文学，我很少接触。平时听士清同志谈起来，娓娓动听，但毕竟所知有限。现在，读了他新近编著的《台湾文学新论》，方才感到台湾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别具风格的一株奇葩。士清同志说，台湾文学的研究现在才真正开始，这说明了他对自己有着更高的期望，祝福他在台湾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结出更大的硕果。

目 录

开拓的实绩——序《台湾文学新论》	蒋孔阳	(1)
大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代自序)		(1)
台湾新文学运动纵览		(13)
汉魂终不灭, 林茂鸟知归		(57)
近期台湾短篇小说主题意识寻迹		(83)
试论“台湾文学”与“台湾意识”		(103)
论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的中国意识		(118)
《文学杂志》与台湾现代小说		(132)
春讯先知的报春花——杨华、杨守愚、陈虚谷的创作		(143)
论杨逵小说创作的历史地位		(152)
试论聂华苓创作思想的发展		(174)
论桑青(桃红)		(185)
於梨华和她的《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		(198)
白先勇的世界、白先勇的梦		(213)
白先勇的小说技巧		(233)
融传统于现代——白先勇《游园惊梦》的艺术追求		(240)
悲悯的追寻——评白先勇的《孽子》		(247)
谈欧阳子的“情结”小说		(260)
诗与情——杜国清的世界		(272)
《我爱黑眼珠》之谜		(286)
王祯和的小说创作		(291)
台湾乡土作家王拓的小说创作		(296)

《城南旧事》从小说到电影	(304)
台湾小说家拾萃	(309)
飞瀑与流泉——郭枫散文漫谈	(323)
殒落了，沙漠之星——三毛的生与死	(330)
透明的黄玫瑰——论三毛的散文创作	(343)
后记	(354)

大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

(代自序)

这次应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邀请，来港与诸位探讨台湾文学的研究，我感到高兴和荣幸。中文大学是人才荟萃之地，也是中外东西学术交流的重镇。以“激扬学术风气、培养文化风格”为要旨的新亚书院，学术气氛尤为浓厚。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大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我想讲三个问题：一、台湾文学的介绍和台湾文学热；二、台湾文学研究的进展和成果；三、对台湾文学研究的展望。

一、台湾文学的介绍和台湾文学热

我相信在座各位都不会怀疑，所谓“台湾文学”，其实是台湾地区的文学，它是我们中国文学的一个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中，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完全隔绝。1979年后，随着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台湾文学作品逐步被介绍到大陆，大陆出现了台湾文学热。

提到台湾文学热，人们也许会首先想到琼瑶。琼瑶热在最近几年席卷了整个大陆。大中学生、工厂女青工、部队的女兵，都卷进了这个浪潮。86年4月，我们复旦大学学生出的快讯（油印小报）上这样描写：“熄灯铃响了，但走廊通明，他（她）们沉浸在书中，《烟雨蒙蒙》、《几度夕阳红》、《在水一方》……

明天老师的课堂提问，他（她）们已置之脑后；期中考试，也不想准备；请安的家信、给爱人的情书，也搁到了一边……他（她）们在为琼瑶小说中的俊男倩女掉泪。他（她）们的眼泪也许可以把琼瑶淹死”（大意如此）。描写不免夸张，但盛况也由此可见了。现在大中城市中，有女学生的家庭，几乎都有琼瑶的书。琼瑶的小说，发行了多少万册，谁也不知道。在琼瑶热之前，就有了三毛热。三毛热比琼瑶热持续得更久。友谊出版社出版了三毛《撒哈拉的故事》、《梦里花落知多少》、《雨季不再来》、《哭泣的骆驼》、《稻草人手记》、《温柔的夜》、《送你一匹马》等7本书后，颇具传奇色彩的三毛，就成了一些女孩子心目中的英雄，她们为三毛作品的三真——真人、真性、真情所感动。琼瑶和三毛的作品都是“流行小说”或畅销作品。我这里用“流行”两字并不带任何贬意。同是“流行”，层次可以不同。从审美的角度看，琼瑶的作品层次不高；但在通俗文学这个层次上，自有其应有的地位。至于三毛，虽然笔触几乎没有离开过她个人的生活空间和情感空间，但是由于她生活经历本身的传奇色彩，使得她的有些作品具有了较为丰富的文化内容，它的层次要高一些。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一开始就讲琼瑶热和三毛热，并不是说大陆的台湾文学热中只有琼瑶和三毛，更不是大陆只介绍琼瑶和三毛，我相信不至于造成这种误会。台湾文学作品登上大陆文坛始于1979年。《上海文学》杂志带了个好头。1979年《上海文学》第4期刊登了李黎的《谭教授的一天》，於梨华的《涵芳的故事》，同时巴金主编的《收获》相续刊登了聂华苓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中的《台北一阁楼》和於梨华的《傅家的儿女们》部分。接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在创刊号上刊登了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白先勇作品的刊出，文坛为之轰动。据说此举在台湾文坛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消息传出去的那天，清晨6

时，白先勇就被电话铃声吵醒，一个接一个的询问：北京发表《永远的尹雪艳》有什么背景？深感意外的白先勇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是谁把他的作品带到了北京？谁决定发表它？为什么发表它？所有这些问题，白先勇都是无法回答的。然而，台湾文学之窗就这样打开了。从此，台湾文坛的历史和现状，作家和作品，就陆续得到了介绍。1979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台湾小说选》，选了杨逵、吴浊流、钟理和、白先勇、於梨华、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杨青矗、王拓、宋泽莱等16位作家的作品。第一次印刷就是10万册。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先勇小说选》，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於梨华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这部长篇小说，也是一印10万册。此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台湾小说选》第二集和《台湾诗歌选》、《台湾散文选》、《月是故乡明》。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台湾作家小说选集》（全四集），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台湾小说新选》（全两集），海峡文艺出版社（前身是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文艺部）出版了《台湾中篇小说选》（已出三集）和《台湾文学丛书》（包括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林海音、三毛等多人的选集），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本人主编的《台湾小说选讲》（全两册），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聂华苓主编的《台湾中短篇小说选》。广播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杨逵作品选》、《吴浊流小说选》、《钟理和小说选》、《陈若曦小说选》、《台湾中青年作家小说集》、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友谊出版社成立后，出书的数量就更多了。总之，1980年后，包括上面所提及的，大陆有70多家的文艺杂志先后刊登过台湾文学作品，还创办了以刊登台、港和海外华文文学为主的纯文学杂志。如《海峡》、《台港文学选刊》、《四海》、《华人世界》和《海外华文文学》等。有20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台湾作家、诗人的作品。1981年，葛浩文教授在《中国

大陆对台湾文学研究概况》一文中说：“我去年在大陆访问几位台湾文学专家的时候，发现他们没听过像黄凡、张大春的名字，而王文兴的《家变》只闻其名没见其书。由于资料的有限，文章无论写得多么好，多么‘正确’，台湾文学研究在大陆仍面对着个很大的阻碍”。时间过去了7年，葛教授所指出的资料问题，因为海峡两岸不能进行直接的文化交流，所以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一旦海峡两岸的直接交流开始，那么所谓的“问题”也就不再存在。现在，在中国大陆，不论是台湾的前辈作家如赖和、杨逵、吴浊流、钟理和，或是50、60年代的作家如林海音、聂华苓、白先勇、於梨华、陈若曦、王文兴，或被称为乡土文学作家的如钟肇政、李乔、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王拓、施叔青；或是现代诗人如纪弦、郑愁予、覃子豪、余光中、痖弦、洛夫、张默、蓉子，以及吴晟、席慕容；散文家琦君、张晓风；戏剧家姚一苇等都有相当高或者说一定的知名度。就是一些新进的作家，如黄凡、李昂、张大春、古蒙仁、袁琼琼、萧飒、蒋晓云等等也都为大陆许多读者所了解。高阳的历史小说，柏杨的杂文也拥有大量的读者。所以，如果说大陆有台湾文学热的话，那末，它开始于1980年，近年来的琼瑶热，三毛热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二、台湾文学研究的进展和成果

台湾文学的研究，在大陆是与对台湾文学的介绍同步进行的，这些年来取得了明显的进展。首先，通过对台湾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工作的实践，使更多的人对台湾文学，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工作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地理、意识上有它的特殊性。1895年以后，它被日本殖民主义割据达50年之久。1949年后，国民党当局迁台，海峡两岸

隔绝已达38年之久。今后，即使解决了和平统一的问题，那末统一后台湾的政治、经济也仍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有变化。这种在不同政治、经济制度下的文化和文学，必然有中国文学的共性，也必然有它的特殊性，认识它的特殊性，并从中找到它与整个中国文学的联结点，这对建设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学事业，是极为重要的。同时，台湾现代文学（包括当代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乳汁滋养下成长起来的，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日据时代的文学是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主义奴役的、追求解放的战斗记录，有着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性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1949年以后的台湾文坛风云变幻，比较复杂，但无论所谓“乡土文学”作家，或是“现代文学”作家，乃至原先的“军中作家”等等，在文学上都有所建树。所谓“战斗文学”是没有多少价值可言的，但当这部分人摆脱了“反共八股”以后，也写出了好的或者比较好的作品，朱西宁的小说《铁浆》、《冶金者》就是例子。“乡土文学”作家，面对台湾本土的现实，揭露台湾社会的黑暗面，同情劳苦大众，对下层人民表现出了深挚的爱心，成就可观。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可以说是其优秀的代表。所谓“现代主义”的作家、诗人，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向西方学习，然后以新的视角反顾中国文化，重新发现传统文化、文学的美，在创作上追求“把传统融于现代，将西洋融于中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白先勇是优秀的代表。他的《台北人》意象丰富，内涵深邃，技巧上熔中西于一炉，风格精致华瞻，在短篇小说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80年代新进的作家，在创作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这些都说明：台湾文学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重视和研究。这里必须着重说明，这种认识，不只是我个人的认识，也是我们许多同行共同的认识。这种认识，是推动

研究工作展开的动力。这一点，在我们编纂《中国现代文学辞典》工作告一段落时，我的感触尤深。《中国现代文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收有作品条目，按年代前后编排，在排列到1966至1976年的十年时间里，整个中国大陆，几乎无一篇作品可以上条目。“文化大革命”，革文化的命。文学史上几乎留下空白，岂不悲哉。好在台湾作家这时写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弥补了历史的空白。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者，我由衷地感谢海峡彼岸的辛勤的笔耕者。其次，在研究工作上也有了明显的进展。在大陆，研究台湾文学起步较早的有周青、封祖盛、武治纯、王晋民等先生。1978年封祖盛在香港读到了台湾文学作品，回中山大学后就开始了研究工作，1980年底，他就完成了《台湾小说主要流派初探》的第一稿。其他人，包括本人在内起步要晚一些，但到1980年初，也大都把研究台湾文学这个崭新的课题提到了日程上来，一时，评介台湾作家作品的文章大量出现。1981年，台湾文学研究又跨进了一大步。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同时开设了台湾文学研究课，把台湾文学提升到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的地位。其时，我给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生和4年级学生讲《台湾文学研究》专题选修课，正逢李欧梵、刘绍铭、郑愁予、杨牧、庄因等一行应邀访问大陆，我们有幸在复旦相聚，切磋探讨，颇感高兴。也就是在这一年，暨南大学成立了港台文学研究室。为了交流心得，进一步推动台湾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82年6月，在暨南大学召开了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来自北京、上海、福建、广东和吉林、山东、甘肃、湖北、四川、广西等省市的台湾文学研究、教学工作者、出版工作者50多人参加了会议。香港作家、评论家曾敏之、高旅、海辛、彦火、梅子、冯伟才，以及旅美台湾诗人秦松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收到了学术论文40篇（其中论述台湾作家与作品的有35篇），出版了《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这次学术会议引起了积极的反